

【当代政治】

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评估:动因、要素、方法

张书林

摘要: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旨在判定衡量其防范化解风险的综合本领及素养。之所以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主要是因为我国已进入结构性风险社会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不稳定因素。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评估的要素构成涵盖七个方面:风险认知能力评估、风险预警能力评估、风险防范能力评估、风险舒缓能力评估、风险控制能力评估、风险化解能力评估、风险善后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法、舆论导向评估法、政治效力评估法、有形损失评估法、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等,是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领导干部;评估;动因;要素;方法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8-0001-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就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①。全会在此列举了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九大能力本领,其中之一就是驾驭风险本领。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可能随时发生。近年来,美国对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干预和打压措施,2019年香港发生持续数月的严重动乱以及2020年春节前后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党和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空前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增强各级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刻不容缓。领导干部驾驭风险本领与应对风险能力是一体同义的概念,很难截然分开。提高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关键是要对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行准确评估,借以形成以评估促提高的动力及压力机制。而且,通过强化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评估,也能够助推形成一种正确的用人导向:把那些在应对

处置重大风险的战斗中真正靠得住、有本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发现出来、提拔重用起来。

一、现实动因

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是新时代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当前,我国处于结构性风险社会时期,一些影响现代化进程的不稳定因素增多,这是强化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

1. 我国已进入结构性风险社会时期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根据其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有结构性风险社会、功能性风险社会之分。结构性风险社会是指基于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价值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是风险社会的深层形态。功能性风险社会是指基于风险认知缺位、社会调节失灵、应对处置不得要领等功能性降低意义上的风险社会,是风险社会的浅层形态。进入结构性风险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主要有: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利益矛盾和利益纠纷频发、加剧;对社会公

收稿日期:2020-04-02

作者简介:张书林,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济南 250103)。

平公正的渴求异常强烈,既体现到理念层面、行动层面、治理层面,更反映到对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诉求上;社会的文化冲突、价值冲突加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社会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东方与西方等的文化与价值相互碰撞,对多元社会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整合面临巨大压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累积性不信任呈蔓延走势,甚至掉入“塔西陀陷阱”之中;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被不同程度地肢解为部门利益、曲解为官员群体利益、瓦解为官员个人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在凝聚整合社会、民众方面的效力下降,非主流意识形态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力在增大;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觉醒、独立性增强、个性充分张扬,组织、权威对个体的束缚力事实上呈现下降走势,社会的组织化、组织化的社会均承受空前压力;等等。依据上述标志性特征来判断,当代中国已然进入结构性风险社会时期。

2.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适应时代潮流、世界大势的发展变化,当代中国的国家转型、社会转型、政党转型也同步展开。在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政党治理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加大了治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就是风险因子。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国家转型、社会转型、政党转型均是向着现代化迈进的。但是,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行进状态,不是一种已然的结果,现代性才是一种结果。一般说来,现代化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风险,充满着不稳定因素。只有当现代化过程走完了,真正达到现代性了,才能最终迎来真正的稳定。所以,在当前我国推进国家、社会、党自身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风险的滋生蔓延就具有了客观性。特别是近些年来,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多,这一问题已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要着力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的重大风险,这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风险弥漫状况的深刻阐释。

3. 舆论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新风险

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基本的媒体生态是“强势建构与弱势解构并存”,国家管控媒体的难度较小、风险较小。在传统媒体

时代,党和政府对信息的可控性、垄断性强,一些负面问题、负面信息通常是以源头控制、有序传播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的,有的很难传播到社会上、群众中。但是,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兴起,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当下的媒体生态正在变为“弱势建构与强势解构并存”,国家管控媒体的难度增大、风险增大。一方面,新媒体、自媒体从吸引眼球、提升关注度的功利性目的出发,以行使舆论监督的名义,往往在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及社会负面问题上浓墨重彩、下足功夫。另一方面,新媒体、自媒体作为信息快速传播的有效载体和平台,又存在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特点,很容易将一些负面问题“小事炒大、大事炒炸”。可见,当下的全媒体、自媒体、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远远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这一舆论传播方式的变化加大了领导干部应对舆论传播风险的难度,使其应对处置风险的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4. 国际国内党内形势的新变化滋生新风险

进入新时代,对于国际国内党内形势的新变化滋生的新风险,我们可以从三个基本维度来透视。

第一,从国际维度上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他们借助搞和平演变西化中国、借助支持分裂势力分化中国、借助支持所谓“民运民权民主势力”丑化中国,在国际社会散布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政治秩序建构、经济贸易往来、文化社会交往、项目发展合作等领域内刻意妖魔化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了刻意捣蛋的“跳梁小丑”。2018年以来,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并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实质上就是美国在“捣蛋”。因此,我国要高度重视美国刻意制造与中国紧张关系的外交风险。

第二,从国内维度上看。当前,我国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造成“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跳出来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从而使改革面临新的挑战。西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闻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错误思潮时隐时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空前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疆独、藏独、“台独”“港独”、法轮功、民运分子等国家和民族分裂势力、分化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挑起纷争、制造事端。诸如

此类的一系列复杂国内问题汇聚在一起,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征程中的各种风险。

第三,从执政党的维度上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作为执政党,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在“四大考验”面前,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变质,破坏了党群关系,给党长期执政带来了风险和隐患。

5. 经济发展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引起新风险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期。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经济转型压力叠加,原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被掩盖、被隐藏、被“安抚”的很多风险性问题开始凸显。比如,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些优惠政策减少,楼市走低、股市低迷,经济投资风险系数增大;环保督查力度持续加大,新旧动能转换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和风险增大;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由于依法治国要求凡事必须于法有据,经济高速发展下很多能够用钱来解决或缓和的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已然行不通了;等等。由此可见,当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使得领导干部承受更多的挑战,对他们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要素构成

就要素构成而言,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评估通常应涵盖以下七个方面。

1. 风险认知能力评估

领导干部风险认知能力是指其对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管党治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的总体认知状况、系统把握程度。

其一,风险认知能力的前提是要有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领导干部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只有先意识到、感觉到了,有了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予以重视。强化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对任何风险隐患都要放在心上,毫不迟疑地坚信这一条:在应对风险上从来都没有什么“万无一失”,只有“一失万无”。

其二,风险认知能力意味着对风险局势、风险样态的全面深刻把握。如前所述,根据习近平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领导干部提高风险认知能力就是要聚焦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这七个领域。领导干部对这些领域的重大风险既要有浅层的感性认知、直观感受,也要有深层的理性认知、规律性把控,更要掌握相应的风险理论并熟练运用于实践。

对领导干部的风险认知能力进行评估应把握的基本准则是:考量其自身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是否得到强化,是否已经具有了成熟的风险思维;考量其能否搞清弄懂正在面临面对的风险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哪些风险因子存在,风险一旦发生,其强度究竟如何,主要看其对风险的存在是否做到了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考量其是否真正将对风险的认知、判断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是否将风险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等等。震惊全国的2018年山东潍坊寿光“8·19”洪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有关部门对泄洪风险的认知缺位、判断失误。这也从侧面表明,此次洪灾事故风险的发生,其实早在对风险认知的环节,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2. 风险预警能力评估

领导干部的风险预警能力就是指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保持足够的敏锐性、敏感性、鉴别力,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在风险的萌芽阶段、酝酿阶段就灵敏地感知到了风险的存在、发展走势及潜在威胁,进而做好应对风险的心理准备、资源准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政治领域的重大风险,领导干部强化风险预警能力就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不良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②。对领导干部风险预警能力的评估,要综合考虑其先前应对风险的已有经验,对风险性质和强度判断的准确性,面对风险的心理强度和承压能力,为应对风险所做的资源准备以及提供的应对风险的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及可行性等方面的因子。

3. 风险防范能力评估

风险防范能力是指领导干部坚持防患于未然,有效阻止风险发生、排除风险隐患的能力,就是有效防止那些潜在性、可能性、苗头性风险最终发展成为

既定的事实性风险的本事。对领导干部的风险防范能力进行评估,就要聚焦可能爆发风险的地域、领域、环节、人群等,综合考量领导干部在风险点排查、潜在风险强度评估、风险点干预处置、风险隐患根除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及其实效性。风险防范能力在领导干部应对风险的能力体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领导干部风险防范能力提升上来了,其在驾驭应对风险时就能够做到“重心前置”“关口前移”,从而将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反之,一些潜在的风险就会演化成现实。近些年来我国发生的几起重特大安全风险事故,究其因由,大都是因为防范不到位、防范流于形式、将防范搞成形式主义而造成的。2013 年山东青岛“11·22”输油管道爆炸事故、2015 年天津滨海新区“8·12”特大爆炸事故、2019 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2·23”矿难等重特大安全风险事故发生之前,都有诸多事故隐患、先兆反复出现,有关部门也是作了开会研究、警告、罚款、督促整改来进行防范,但是最终都是流于形式、流于表面,不是真下狠心、下死手去抓落实。结果,量变最终发展为质变,导致重特大风险事故发生。

4. 风险舒缓能力评估

如果我们实施了最大限度的防范并付出了最大努力,风险还是发生了,那么,风险发生后,就要第一时间进行舒缓,力所能及地释放风险中蕴含的负能量,降低风险发生的烈度、强度、破坏力。对领导干部风险舒缓能力进行评估,应把握的基本准则是:沉着冷静,不能自乱阵脚、惊慌失措;要看得清、判断对、下手准;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多措并举进行舒缓;要辩证施治特别是首先从治标上进行舒缓,先控制风险“火灾”的火势、扑灭风险火灾的“明火”;等等。

5. 风险控制能力评估

风险控制就是指风险发生后,在进行了初步舒缓的情势下,对风险发展蔓延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综合性的干预和削减。领导干部控制风险发展蔓延的本领,就是其风险控制能力。领导干部的风险控制能力评估通常应包括:正确选用风险防控预案,介入到风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保证风险演进的全程可控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风险发展蔓延可能导致最坏后果的准备,同时尽最大可能谋求防控风险的最好结果;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舆论引导工作,把控社会舆论、网络舆论走向,防控负面舆论、虚假

信息借机煽风点火、火上浇油;控制风险的“火势”蔓延,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连锁反应;做好当事人或关联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之保持心理平静,防止出现心理防线的崩塌;等等。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领导干部的风险控制能力评估,要特别关注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的能力,这方面的能力在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评估中应占据重要分量,需要予以特别考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提出,领导干部提高政治本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③。实践表明,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风险控制能力、协调沟通能力、深度动员能力,就不能有效阻断生态风险、灾害风险等向社会风险进而向政治风险的转换,就不能有效阻断非公共性风险被转换放大为公共性风险,就不能真正规避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把“小事搞大”、把“大事搞砸”的问题。

6. 风险化解能力评估

风险化解能力就是指领导干部最终解除风险的本领。比如,2003 年“非典”发生后,我们党及时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很快战胜了非典,成功化解了“非典”这一公共卫生风险、党的执政风险。其他还有 2008 年云南孟连事件、2008 年贵州瓮安事件、2009 年湖北石首事件、2018 年山东平度事件。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果断处置并最终顺利解决,意味着最终完成了风险处置化解。

习近平指出:“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④具体来说,领导干部风险化解能力的评估应涵盖他们在终结风险进程、平息风险事态、消除风险影响、平复民众心理、恢复风险前的原状等方面的行为效度,主要包括:在终结风险的进程是否能够做到科学果断决策,平息风险事态是否能够做到干净利落,消除风险影响是否不留后遗症,平复民众心理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和可能做到公平公正,恢复风险前的原状是否能够尽力做到严丝合缝,等等。

7. 风险善后能力评估

风险善后就是指程序性的风险化解处置工作完

成后,还要随之跟进做好舆论引导、风险补偿、经验教训总结、举一反三风险隐患排查、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工作,以力求切实消除风险因子,根绝风险事故的再次发生。领导干部这方面的能力素养要求,就是风险善后能力。风险善后虽属于亡羊补牢之举,但是鉴于防控应对风险是长久之策而不是权宜之计,是需要坚持不懈常抓在手的工作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之事实存在,它对于领导干部防控应对风险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领导干部风险善后能力的评估,要着力围绕以下基本面展开:是否能够掌控正确舆论导向,引领民众认知、网络和社会舆论回归客观、回归理性;是否对风险中的利益受损者进行了适当强度的风险补偿,使其从中受到安抚慰藉;是否真的能够从风险的发生蔓延中得到教训、从应对化解风险中总结经验;是否能够以风险为契机举一反三深入排查风险隐患,防范杜绝类似风险的重复上演;能否在风险化解处置完成后,从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等入手,推进建成适合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特点的风险防控机制,沉淀形成风险防控的制度成果;等等。

三、主要方法

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关键是要方法得当,否则,就有失客观公允。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这些方法,有时可以单独采用,有时可以合并采用。

1. 指标体系评估法

所谓指标体系评估,就是指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统一,科学设定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的各级各项指标,明确各级各项指标的权重分值,对指标进行量化打分,依据最终得出的权重分值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总体水平作出测评。

一是进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的要点是:领导干部应对风险的过程是否始终坚持了党性立场、人民立场,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否做到了科学决策,是否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框架内展开,是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的破坏力。

二是进行定量分析。首先,从风险认知能力、风险预警能力、风险防范能力、风险舒缓能力、风险控制能力、风险化解能力、风险善后能力等七个方面设

定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一级指标,并以百分制确定各个一级指标的相应权重分值。其次,在一级指标之下设立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之下设立三级指标,以此类推,进一步细化指标权重分值。最后,由组织人事部门以指标权重分值为参数,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各级各项指标进行量化打分,以最终的得分结果为依据,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高低强弱作出评估。需要指出的是,采取指标体系评估法对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评估,第一步是进行定性分析。如果通过定性分析发现领导干部不过关,那么,以设定各级各类指标为内核的定量分析测评,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了。

2. 舆论导向评估法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强弱,群众最有发言权。如果大众媒体、社会舆论的主流意见认为某一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是低下的,那么组织人事部门就要高度重视民意,决不能置若罔闻。否则,社会大众就会对评估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进而引发信任危机。运用舆论导向评估法,要注意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正确看待舆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无论是赞扬的或是批评的舆论,领导干部都要真诚欢迎。当前,有的领导干部视舆论为洪水猛兽,在遇到批评的舆论时,惊慌失措,避之尤恐不及,千方百计地“灭火”。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习惯于在有批评的环境下生活,正视批评的舆论,积极解决问题。二是正确分析舆论。时下,一些群众抱着对自己言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发表正确的、客观的、理性的言论。然而,也有少数人不负责任地发表一些非理性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言论。在泥沙俱下的舆论面前,组织人事部门要深入细致地做好舆论甄别工作,善于发掘主流舆论,从民意中判断领导干部应对风险能力的强弱。

3. 政治效力评估法

所谓政治效力评估,就是指对领导干部处置应对风险的结果在塑造党和政府形象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正向影响力作出评价分析。它涵盖两个要点。一是是否提升了政府公信力。领导干部在处理重大社会风险时,是否能在危难时刻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风雨同舟、共克时艰,从而使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更加信赖党和政府,更加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二是是否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领导干部在化

解重大社会风险时,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积极应对并妥善处置风险,优化了党和政府形象,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点赞,建塑起“人民政党爱人民、人民政府爱人民”的光辉政治形象,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4.有形损失评估法

所谓有形损失评估,就是指对领导干部在应对风险时造成的有形损失进行评估。由于应对风险不及时、处置风险不得力、化解风险不得法,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往往会遭受有形损失。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有形损失评估法,对领导干部的应对风险能力作出判断。这里需要明晰三个问题:其一,有形损失评估是在风险发生之后、危害结果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通过统计计算得出的;其二,有形损失评估必须要由国家统计机构、国家有关部门认证的第三方权威评估机构等实施并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其三,有形损失评估通常计算的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生命财产损失,并没有充分考量风险发生发展蔓延所造成的间接性、潜在性损失。

5.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

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实际上是情景模拟法和案例法两种方法的有机融合,主要应用于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对拟选用人应对风险能力的测试性评估。它是根据对拟选用人的应对风险能力进行考量评估的要求、重点、要点,来设计风险发生发展蔓延的现场情景,让拟选用人置身逼真的现场作出快速应对,并根据拟选用人风险发生发展蔓延的各个环节流程中的具体表现、对潜在或显性风险问题的处置方式、风险应对的质量成效等综合因素的考量,

来最终判断评估拟选用人的应对风险能力状态的一种评估方法。

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在运用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以下要点:其一,根据应对风险能力评估的要求和重点去设定情景、选择案例,最大限度地实现情景与案例的高度吻合。其二,以情景模拟案例来评估领导干部、拟选用人的应对处置风险能力,必须组建“领导+专家+群众”的“三人团”,在作出评估时,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和感受。其三,由于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是一种专业性的评估方法,组织人事部门如果将其委托给权威性的教育培训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去做,更能体现出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可信度。其四,运用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要求领导干部、拟选用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风险推进的进度作出快速准确的反应,其时效性、实效性的要求均很高。其五,运用情景模拟案例法去评估领导干部、拟选用人的应对处置风险能力,不是被评估人的“独角戏”“独唱音乐会”。在模拟的风险应对处置过程中,被评估人必须与其他人进行协调沟通配合。因此,情景模拟案例评估法同时考量的的是一个地区、单位、部门应对处置风险的“大汇演”“大合唱”。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②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9年2月28日。④《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

责任编辑:文武

Assessment of Leading Cadres'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s: Motivation, Elements and Methods

Zhang Shulin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to cope with risks is to determine and measur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risk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leading cadres'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s is tha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structural risk society, and there are unstabl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elements of the assessment of leading cadres' ability to cope with risks include seven aspects: risk cognition ability assessment, risk early warning ability assessment,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assessment, risk mitigation ability assessment, risk control ability assessment, risk resolution ability assessment, and risk rehabilitation ability assessment.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index system, public opinion oriented evaluation, political effect evaluation, tangible loss evaluation and scenario simulation case evaluation are effective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to deal with risks.

Key words: leading cadres; assessment; motivation; elements; methods